

莫赓

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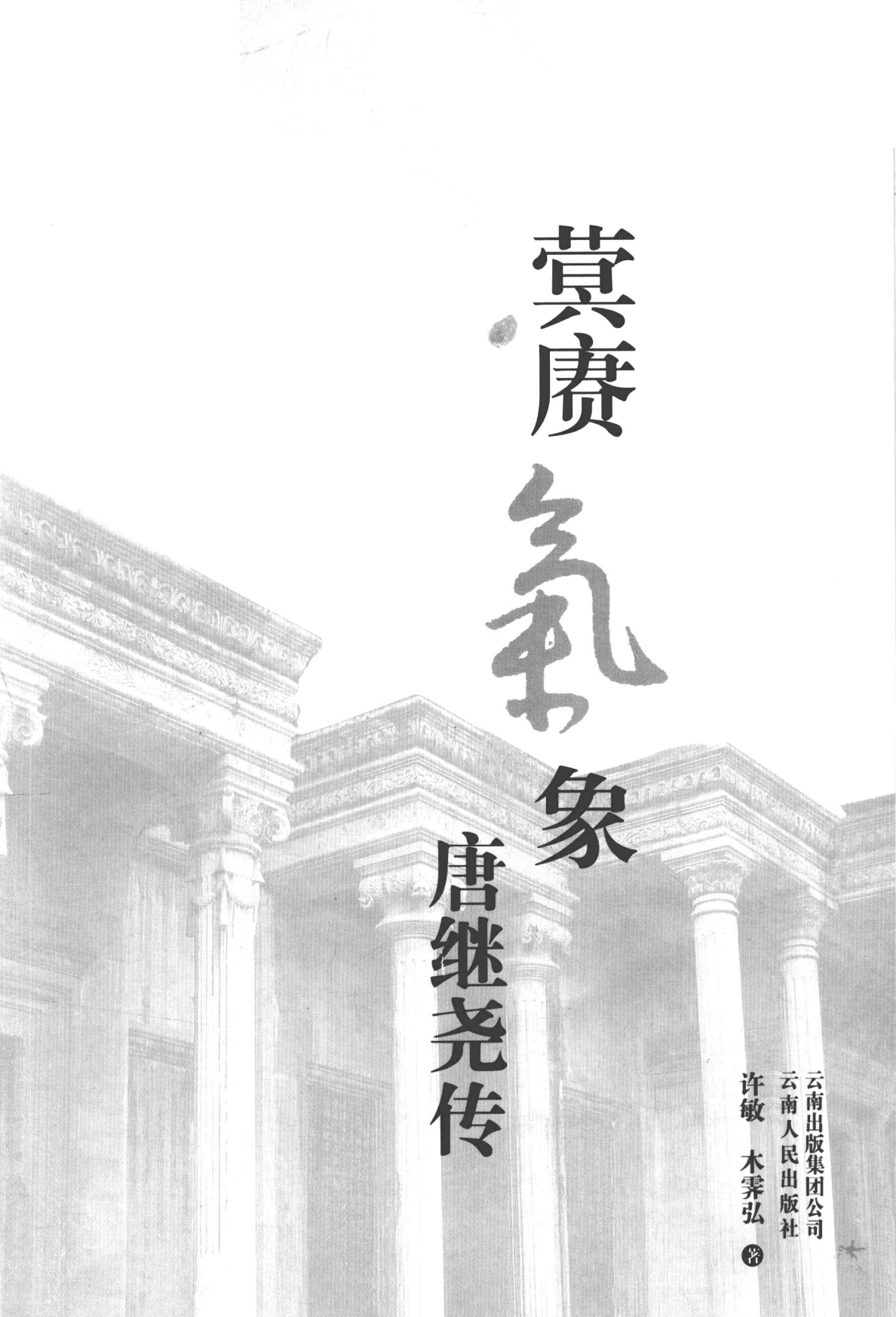
象

唐继尧传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许敏 木霁弘 著





莫賡 氣 象

唐继尧传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许敏 木霁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赓气象: 唐继尧传/许敏, 木霁弘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1.11

ISBN 978-7-222-08524-4

I. ①莫… II. ①许… ②木… III. ①唐继尧
(1883-1927) —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1914号

出品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赵石定 王 韬

装帧设计: 杨晓东

责任校对: 王 韬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名 莫赓气象——唐继尧传

作者 许敏 木霁弘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hs@public.km.yn.cn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2.25

字数 450千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雅丰三和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8524-4

定价 50.00元



目录

楔子	1
第一章 天曦	3
第二章 曙晖	51
第三章 朝日	95
第四章 艳阳	151
第五章 昶光	225
第六章 环蚀	279
主要参考书目	362

楔子

公元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与日本军队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史称“七七事变”。全世界为之震惊。

三天之后，位于中国西南一隅的云南省省会昆明一个被称为大观楼的公园里，一座大型铜雕像正式落成。

这是一个中年军人的全身戎装像，他骑着一匹雄健的战马，手挽皮缰，腰挎战刀，挺胸昂首，极目远方。

斯人为谁？

摆放雕像那3米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正前方，一行工整的隶书明白地写着：

会泽唐公莫赓像。

谁令一员如此英武战将立马于此？

隶书左边那行字写道：

云南全省军政各界及民众公立。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题诗《莫赓总裁铜像揭幕典礼》对这位军人的曾经做了简要的概括：

桓桓唐公，革命英杰，
讨袁护法，丕扬大烈。
功在国家，泽流宗邦，
郑哀子产，蜀祭武乡。
巍巍遗像，南服是式，



洱海苍山，奋乎百世。

如果说任公有些掉书袋而故意让一般百姓读起来为难的话，两年由国民政府颁发那道追怀先烈、用彰潜德的褒扬令则说得比较直白：

“故陆军上将唐继尧，精娴韬略，夙志匡时，辛亥光复之役，率军回应，克定边陲。嗣值袁氏僭号，首义滇省，维护邦基，厥功尤伟，亟应特予褒扬，用示政府追念勋贤之至意。此令。”

铜像正式落成五个月后的12月25日，是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这一天，忙于抗战的国民政府特发明令，为唐继尧补行国葬，令云：

“故陆军上将唐继尧，于洪宪叛变之际，首义滇疆，声讨帝制，保障民国，卒使奸宄夺魄，国基重固，革命大义，于以昭宣。志节劲于风霜，勋业炳于奕祀。当此起义纪念之日，弥深追怀前烈之思。唐继尧应特予国葬，以示崇报，而资矜式。此令。”

至此，这个从云南的崇山峻岭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大地之子在自己热爱的国家那里有了一个明确的标点符号。而一时人品，却已逝去了十一个年头。

露如珠，月如圭，血三年而藏碧，魂一变而成红。曾几何时，虎帐夜谈兵，静若墨空之列宿。柳营春试马，动如流慧之互奔。气夺山川，色结烟霞。将军一去，大树飘零。与子之别，心思徘徊。





第一章

天曦





光绪皇帝



慈禧太后



大清光绪九年，公元纪年 1883。这年的 7 月 12 日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又是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富人依然锦衣玉食，心情愉悦，好整以暇地享受着上天特意赐给自己的美好时光，穷人则以一种漠然之情，冷冷地看着那个不属于自己的美妙世界。天下大同的唯一标志是男人都拖着一条独辫而女人绾着髻。这天，家居云南省东川府会泽县的年轻士绅唐学曾之妻李氏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这是唐学曾的第一个孩子。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唐学曾对得子一事非常欣慰，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能够为唐家延续香火无论对个人或者家族来说都是件天大的事，而在累世读书的唐家，以“忠恕”二字为家传，世代都是推崇“百义孝为先”的。至于年轻的李氏倒没有多少这方面的深刻认识，从嫁入这个家的那天，她就在为生子做准备，这是女人的宿命，从前在父母家做女儿时就被称为“待字闺中”，所谓“字”，不就是在屋宇之下生孩子么。自从怀孕那天，这个女人便如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她已经认清自己一生的使命和到这个世上生存的目的。她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需要她，她从前的性情和嗜好都因结婚生子而变换了，一切都服从于这个重要议题。她心态十分平和，因为她生命的中心主动力已经有了表现和发挥的机会。经过撕裂身体的疼痛之后，一个面庞饱满的男婴呱呱坠地。对于一个母亲来说，生产就是新希望的诞生，仅此而已。至于以后有人极言李氏生此儿之前夜曾梦见大火熊熊，日月入室，相信只是牵强附会之说，因为唐学曾夫妇在这个儿子 15 岁中秀才之前，一直是将他当作普通人家的普通孩子来教育抚养的。

唐学曾翻阅唐氏家谱，“学”字辈下为“继”字辈，“继”谁为好？宇宙之间，读书人无限景仰者惟三代明君尧、舜、禹而已，“尧”居首。于是为孩子取名继尧。字冀赓。“冀”，是个意味深长的字。它与莢构成一个词——“冀莢”，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象征祥瑞的草。而与荇则构成另一个词——“荇冀”，这是种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叶子长椭圆形，花小，白色，总状花序，角果扁平。全草入药，以杏林仙株泽被人间。至于“赓”，为继续之意。字是父亲斟酌的结果，选择继尧为名、“冀赓”为字，家学渊源的学曾先生毫无疑问地在儿子身上寄托着不少此子长成之后能够成为济世之材的美好愿望。

上千年以来，会泽人当地人就有一种地域自豪感，因为会泽处于一个区域的中心，从雍正六年起，东川府与会泽县的治所皆在会泽县之钟屏



镇。这种事情大概只是对会泽县的县太爷一个人来说有点儿心中不爽。中国官场历来有这样的说法，道是：“三生作恶，府县同廓”。与知府老爷同处一城，方方面面都显得不太方便，在别的地方七品芝麻官可以是威风的“鸡首”，而“府县同廓”之后马上成为“牛后”。但是老百姓不管这些，他们只知道，以会泽为圆心，东川府的影响力就此扩散开去。在乌蒙山金沙江一带，说起会泽，谁不竖起个大拇指？因为这里盛产一种闪亮的金属——铜。黄灿灿的铜被人称为“美金”，自古就是制造华夏货币不可或缺的材料。在大清乾隆朝，八省京铜全到东川府采办，中央政府从这里一年调走的铜达千万斤，支撑着国家财政铸币的半壁江山。如今的东川府仅辖一县一厅，但从前很牛，在明、元、宋、唐时期，几乎整个滇东北包括四川的部分地区都曾经被它的政治光辉笼罩过。会泽处于滇、川、黔通道上，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过客从这里走过，也有很多会泽人从通道上走向他乡。

所谓一方土养一方人，地理特质直接影响着生于斯、长于斯之芸芸众生。会泽人说会泽风水好，能出文人墨士，又因县名“会泽”谐音“汇泽”，所以此地之人官运亨通。风月山水间，清魂销于绝响。文风昌盛，文脉悠远，自然是花有独蕴之香。

这里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秀美的峨嵋栲、雄健的云南松、挺拔的滇青桐……在娇媚的二月，山坡上和峡谷中就已经盛开着烂漫的山茶、绚丽的杜鹃、幽香的兰草……参天的古木蔽日遮天，藤垂萝绕中草深蔓长，间或从茂盛的枝叶里漏下点点阳光，化成斑斑光影洒在林地上……曾经有人这样描述：“山冈斜坡上全都是森林，一直延伸到山下去。如果在雨季，会有一个一个小沼泽散布在森林里，像是森林里的水为了憧憬蓝天而聚集在这里。不透明的沼泽水唯有光线射入的部分获得朦胧的、金色的透明。偶尔会有一片红色的落叶在透明间闪烁，然后慢慢地翻个身沉进水里。人在注视着一番番情景的一个个刹那间，就会感到宁静和幸福”。

唐家在这个十分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到唐继尧问世时已经传了十二代，将唐氏一脉从湖北带到云南曲靖居住一段时间然后又迁到会泽定居的是一文一武两兄弟，文者为在朝廷做过都御史的唐时英，武者为在朝廷做过武略将军的唐朝英。虽然说起来都御史与将军都是在那个阶级分明的社会里有一定地位的人，但是唐家的这两位祖先很可能并不威名显赫而且在

官场里混得极其一般，因此才会双双举家由内地迁到边鄙。总而言之，后来光耀地方，享誉华夏的唐莫赓属于那种没有高贵祖先的天才。

唐继尧出生的第二年，一件对大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有着深远影响的事情发生了。法国军队对清帝国的属国安南的北宁、太原、新化等地发起肆无忌惮的攻击，并顺利占领之。整个红河三角洲数月之内全在其武力控制之下。之后，霸气十足的法国政府代表在天津与大清朝廷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明确了法军在安南存在的权利。得寸进尺的法军又于6月23日进攻谅山，制造了震惊中国朝野的“谅山事件”。一系列对泱泱天朝的军事试探说明，中国这个东方巨人已经完全而充分地泥足化，它不仅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南方属国，甚至连自身也照顾不好。法国派出的远征舰队在轻松自在地“游历”了福建水师的基地马尾军港后，又从容地向台湾进发，并朝看上去戒备森严的基隆发炮做试探性攻击，中国军的还击炮火非常弱，寥寥数炮，仅仅在海面上溅起几彪水柱，而且事后中央政府发出的抗议声比蚊子的嗡嗡声还小，骄傲的法国佬十几年一贯制地告诉中国人：“伟大的法兰西说听不见就是听不见。”

8月16日，法国议会通过了3800万法郎的战争军费。一周后，中法马尾海战爆发，福建水师惨遭蹂躏。10月，法国海军攻陷基隆，并宣布封锁台湾海峡。

1885年3月，法国陆军挟在安南战无不胜之威攻击中国边庭镇南关，与清将冯子材遭遇，两军鏖战于野，装备精良的法兰西人意外大败。冯子材乘胜追击，收复了2月中旬陷落的越北重镇谅山。而胆战心惊的清政府为顾全大局，一道诏令叫停了因迟来的胜利而热血沸腾的前线将士，于当年6月与法国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定安南条约》，体面地结束了中法战争。自此，中国人与跨洋远道而来的法兰西人比邻而居，其乐也融融。而总喜欢到别人家串门儿的法国佬也就当仁不让地顺势将脚跨入了中国的两广和云南。

在此之前的1840年，西方列强已经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以《南京条约》为首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令中国人难以动弹。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世界东方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立志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在法国人之前，英国已经把与云南接壤的缅甸、老挝等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对此，云南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





1874 年底，英国派遣由英军军官柏朗率领的“第二次探路队”企图越过中缅边界进入云南省的腾越、大理地区。英国驻华公使派译员马嘉理专程从上海到中缅边境接应。1875 年 1 月中旬，马嘉理一行经昆明、大理、保山、腾冲和盈江芒允街进入缅甸八莫，与柏朗的探路队会合后，组成 193 人的队伍向中缅边境进发。2 月 21 日，当马嘉理出盈江芒允街西行迎接柏朗探路队时，遇到云南边民和官兵的强力拦阻，马嘉理开枪，打死中国边民 1 人。中国官军当场格杀马嘉理及其随从 5 人，并将进入云南的英国探路队赶出了国境，史称“马嘉理事件”。事后，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与云南直接有关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烟台条约》。从此，英国人打开了中国的西南大门。

作为帝国主义俱乐部的二流成员，法国人并不甘居中游，曾经称霸欧洲的他们也渴望在列强世界不断洗牌与发牌的赌局中重新做大做强，于是，他们把筋肉发达且多毛的手伸进了与大清王朝关系非同一般的安南，并以此为跳板，向中国内陆地区进行三级跳，而第一落点就是云南。说来令人惊诧，此时法国人的主要目光聚焦所在，居然是这个地区以及毗邻省份盛产的鸦片。

其实这一点儿不足为奇，在法国人统治下的安南，殖民主义的维持并非法国人出色的行政计划，而主要是建立在鸦片收入的基础之上。在东南亚，除了菲律宾以外，所有帝国主义建立的殖民地都对鸦片实行国家垄断，因为鸦片在殖民积累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 17~18 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向爪哇输入 56 吨鸦片。而在新加坡，华侨商人缴纳的烟税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40% 以上。法国总督保罗·杜梅尔在印度支那专门成立了鸦片专卖局实行垄断经营，其丰厚的收入远远超过同样具有垄断性质的酒类和食盐，占财政总收入的 20%。当时，鸦片和大锡是法属印度支那从中国购买的主要商品，除了供应殖民地外，鸦片还被运往法国本土赢利。通过那些在枯燥而漫长航程中发现了鸦片若干妙处的海军军官，已经有为数不少酷爱猎奇的法兰西时髦人士开始垂青并迷恋上这种刺激性十足的玩意儿。而负责引领海外流行消费的海军军官们当仁不让地成为鸦片的最大拥护者，据当时的一份治安报告估计，在法国海军的总人数中有超过 40% 的军官热衷于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但是这宗商品在中国境内的运输却成为令印度支那统治者头疼的大问题，为了“获

得更多的鸦片出口，一方面满足鸦片专卖局在越南的需求，另一方面参与在中国的鸦片贸易”，滇越铁路的修建被法国人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很快便与中国有关当局达成了筑路协议。虽然中法双方的当事人都对修建这条铁路的真正用意心知肚明，却碍于鸦片在国际社会的肮脏名声不得不制造出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使之辉煌。

法国驻昆明总领事奥古斯特·弗朗索瓦负责确定这条铁路的走向，并同时考察云贵高原的鸦片种植情况。他在向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里说，1875年，仅仅是云南种植鸦片的土地就占了全省可耕地的三分之一以上，以后逐年递增，到1900年则已经到了一半。主要集中于滇东北的红土地带。而据英国驻宜昌领事估计，从1880年开始，仅是四川、云南和贵州三个省生产的鸦片就达1.47万吨。到20世纪初期，中国生产的鸦片达2.2万吨。而在19世纪以前，中国的土地上并不如此大规模地生长着这种色彩艳丽的恶之花。

鸦片是在唐代由阿拉伯商人作为药材引进中国的，但是直到1720年才被中国人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尽管当时雍正皇帝已经认识到这种东西可能会对人的身体和社会造成严重危害而颁发谕令禁止进口非药用鸦片，对敢于经营鸦片馆的老板格杀勿论，但是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困扰，吸食鸦片的现象屡禁不止，且日益在大清社会中蔓延。

禁吸鸦片之所以有极大难度在于中国对“阿芙蓉”有浓厚兴趣的人全是 有钱有势的上层人士，构成人员包括宫中的大太监、满族官员、大家闺秀、待缺的官员、应考的富家子弟……而吸食鸦片成为一种人人追捧的大时尚，“吸了吗？”成为一句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问候语……目睹这样现象的一位法国人夏尔·德贡斯当在他的记述中写到：中国人“对这种麻醉药的瘾头胜过任何信仰”。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罗大众也对鸦片趋之若鹜，然而他们却是将之视为一种万灵药，用于止痛，治疗疟疾、慢性痢疾甚至霍乱。根本舍不得将得来不易的黑色宝贝变成一阵烟雾吸入肺部。

到了1800年左右，嘉庆皇帝针对鸦片的泛滥颁发谕令，禁止进口鸦片而且禁止国内生产鸦片。十三年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谕令出台：禁止官员吸烟，违者罢官并处杖一百大板，枷号示众两个月。但是所有的禁烟措施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鸦片的诱惑力实在过于强大，在中国辽阔的土地





上，海盗、秘密会社和贪官污吏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合力将贩毒事业操作得有声有色。1823年，英国销往中国的鸦片为475吨，到了鸦片战争前的1938年已是2800吨。由于商品供应量充足，之前的卖方市场逐渐成为买方市场。商人们竞相压价出售，印度鸦片的价格已经能够为中国广大劳动阶层所接受，于是，一支吸洋烟的大军吹响了集结号。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不吸洋烟的成年人少之又少，堪称凤毛麟角。

中国大批购买鸦片致使白银外流，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每年白银外流200万两，到30年代，平均每年达到900万两。结果就是外贸停滞，资金短缺，农产品价格下降。面临这样的局面，执政的道光皇帝在忧心忡忡之余，重新在朝廷内部发起对禁烟政策效果的讨论。在1836年的一次宫廷会议上，有大臣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 一、重新修订禁烟条例，同时强调禁烟对总体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
- 二、维持在官员、士兵和知识阶层中禁烟，同时重新确定进口毒品的范围；
- 三、鸦片作为药材可以进口，但应征收关税；
- 四、鸦片贸易由中国商人进行，在交易过程中要坚持以物易物的原则。

这种系列主张旨在限制吸毒，增加财政收入，制止白银外流，减少官员腐败，刺激本国鸦片生产并最终取代印度鸦片。但是主禁派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毒品导致人们精神沉沦，行为堕落，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应该采用强硬的镇压措施，洋人贩烟与中国人同罪。道光皇帝在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采纳了主禁派的主张，派林则徐于1839年赴广东查办鸦片。在林则徐严厉的措施面前，英国鸦片商人表面屈服，背地里却调唆英国政府以炮舰迫使中国接受鸦片自由贸易，在利益和道义面前，道貌岸然的英国绅士选择了前者。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结果就是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之后，毒品走私在《南京条约》中规定的5个通商口岸日益猖獗，几近失控。之后，中国人的强烈抵制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又败。此后，用于“医疗目的”的毒品进口完全合法化。

在1850~1870年间，与中国人进行商业交易的外国商人已经习惯将鸦片作为交易货币来购买中国产品，而中国人也习惯成自然地接受了这种以鸦片作为支付手段的方式并在国内贸易中普遍采用。在长达20年平息太平

天国的战争中，有 3000 万人民流离失所。作为一种财政上的应急措施，朝廷和各地方政府对见效迅速的罂粟种植放任自流。地区间的鸦片贸易价值超过了稻谷和食盐。种植罂粟对农民来说并非难事，罂粟被他们称为“懒庄稼”，比种植其他作物简单省事不说，收入还成倍增长。如在山西，罂粟的收入是小麦的 3 倍，而在陕西几近 4 倍。1880 年，中国进口了 6500 吨鸦片，其中大部分产自印度，然而从这年后，中国自产的鸦片便逐渐取代了进口鸦片，除了供应国内市场，还有了向外出口的余量。这一时期鸦片的主产地是四川盆地东南部地区，那里气候非常潮湿适宜罂粟生长。在 1883 年，整个四川生产的鸦片达到 1.14 万吨，等于中国当年进口量的 2 倍。在滇越铁路修通之前，云、贵、川地区的鸦片外销是通过长江大动脉来完成的。在国际市场上，产自中国的鸦片比产自印度的鸦片不仅价格便宜将近二分之一而且口感还更好，尤其是产于云南红土地上的货色，其中的吗啡含量极高。在鸦片行家眼里，“云土”是当之无愧的“土”中极品。而对于国内外有品位的烟客来说，能够经常有“云土”在一旁陪伴，自是人生中相当幸福的事情。由于“云土”崇高地位的推动，漫山遍野绽放的罂粟花成为当时云南大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这是鲜艳养目的自然之花，也是赖以维生的经济之花，它们铺天盖地，为贪婪的帝国主义和云南百姓而盛开。

到 1911 年以前，清政府与英法两国订立多项与云南有关的条约，主要有：

1885 年与法国签订的《越南条款》；

1894 年与英国签订的《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

1897 年与英国签订的《续议缅甸条约附款》；

1903 年与法国签订的《滇越铁路章程》。

利用这一系列条约，英、法在云南取得了许多特权，如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权、红河上游航行权、滇越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传教士自由传教权、开矿权等，并迫使中国政府先后开放了蒙自、思茅、腾冲 3 个海关。与此同时，大批西方传教士涌入云南。很难说这些上帝使者的思想动机全是为了传播天国的福音，英国传教士给景颇、拉祜等民族信教群众上课，第一课教的是：“我们的国王是伊丽莎白”。之后是“汉人来了，我怕！”

在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云南之前，云南封建社会里已孕育着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它们微弱地成长在采矿业、冶金业及昆明等中心城市商业、手工业中，然而，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和商品的大量输入，这种可能令封建制度最终崩溃的萌芽成长得十分艰难。

但在会泽县城这样弥漫着浓郁中国农耕文化气息的城镇里，人们却照样按照几百年前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除了照料与鸦片生产销售有关的事宜外，鲜有改变。拿唐继尧的父亲唐学曾来说，前半辈子唯一拿手的事情就是读圣贤之书，他曾经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而在东川府的学宫做预备生，在这个专为科举而设立的学校里为成为一名正式庠生而孜孜不倦。他与其他人读同样的书，吃同样的饭，同样刻苦学习。在教授、学正、教喻、训导之类教官的严厉督导下，悬梁刺股，应付月课和季考。他心如止水，在严肃森然的传统学习氛围中与冰冷乏味的经史子集耳鬓厮磨，既没有宗教想象的侵扰也没有狂生一如既往的诗酒流连。但不知是禀赋差还是运气晦，同窗学友陈荣昌已经金榜题名中了进士，他却依然连秀才的头衔也不曾有。在那个时代，读书人没有功名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但他却始终淡定，他坚信事情会如同长辈们所说的那样：唐家因自己的祖母和母亲抚孤守节有好报，必续大发。他只是不知道这种好报会应在唐家子孙中的哪一个身上。

1897年，学曾的弟弟学闵考取乡试，中了举人，这是唐氏门中的第一个文举人，自从来到会泽这个地方，大大小小的各项功名唐家人获得过不少，包括有岁贡、副榜、武举、廪增、附监等，但从来没有一个文举人，学闵中举，已经是踏上了正式科举考试的第一节台阶。正式的科举考试共分为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通常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被人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有资格参加乡试的是秀才，但并非所有秀才都能够去参加乡试。在参加乡试之前秀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者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中举之后紧接着就参加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的会试，取中后称为贡士，贡士才有资格赴京城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通过后统统称为进士，其中最吸引天下人眼球的自然是被赐“进士及第”的三鼎甲，即第一甲中的状元、榜眼和探花。然而“举人”在世人眼里已经是一项很了不起功名，可以名正言顺地被世人称之为“老爷”。为此，全家人欢欣鼓舞，以为冥冥之中果有定数。

之后令唐学曾欣慰的是：儿子唐继尧 15 岁时应童子试中了秀才，年纪尚轻却已在功名碧潭中露出了小荷之尖尖角。看来今后在政治上会比自己有出息。在中秀才这一年的冬天这孩子曾经写过一首七言咏雪诗，诗道：

百卉争春太平平，梨花浓重柳花轻；
大公最是寒天雪，点缀乾坤一样清。

唐学曾从诗中隐隐感觉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豪气。他觉得儿子的心很大，至于有多大，他也有些拿不准。俗话说，知子莫如父，但是他看不透这个话不多的儿子，其实唐继尧早熟，对人类与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并有自己的判断，可不是一般同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唐学曾按照老方法勉励儿子：“天之所赋予人者，性也。性之所资于人者，学也。性有颀蒙明敏之异，学有日益无穷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学之所资，未有业不精于己者也。唐氏世德之后，必有达人，食报当不远也，汝曹勉乎哉！”

所谓“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是一句老话，学曾先生的母亲朱氏在丈夫早逝后经常用它来鼓励为功名埋头苦读的唐学曾兄弟，如今学曾先生将它传递给儿子。

一些从衙门里透露出来的消息也让唐学曾悲喜：发榜前，县令大人调阅了唐继尧的试卷，很惊奇自己治下的这个年轻人竟然能够写出如此一手好文章，且试卷上那一笔颜体书法环转回互，舒伸曲折，颇得鲁公之髓，且有凌云之志。他考虑在发榜时将唐继尧之名列于榜首，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有一些心怀妒意的人在他耳边说了不少诋毁这个孩子的话，大人于是乎变得慎重。但在之后，院试学使田园大人也看到了唐继尧的试卷，拍案称奇不已，专业人士自然要专业一些，发榜之日，唐继尧名列榜首，并补博士弟子员。

如此年轻就中了秀才，唐继尧一时间成为会泽县城里知名度颇高的后起之秀。大家都觉得一脸福相，满腹诗书的唐家大少爷日后可以去考个进士，然后进入翰林院以文墨供奉朝廷，或者在六部做个主事，或者到什么有空缺的地方去做个知县。总而言之，不少人非常看好这个小秀才的前途，其中包括会泽县的县令陈月溪陈大人。唐继尧自己也信心百倍，他 6

